

□ 百年诞辰纪念文稿

对未来的憧憬，以及获得这份崇高荣誉的激动。同年11月，葛先生和夫人何怡贞带着7岁的女儿和2岁的儿子从美国登上“戈登将军号”，急不可待地踏上了归国的航程。

叶企孙先生不仅是葛先生，也是一代物理大师们人生旅程中的恩师和贵人，由他和他的弟子们至少撑起了中国物理界的半边天，惠及当今，绵延无尽。其中包

括彭桓武和钱三强，他们两位和葛庭燧分别于1935、1936、1937年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，然后分别于英国、法国、美国做出了杰出的成就，又分别于1947、1948、1949年被聘为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。当时清华大学物理系一年仅聘一个教授。这所有的人才点将都源于“清华有个叶企孙”。

（原载《文汇报》2013年5月8日）

他劝弟子别做学术界的“二道贩子”

——纪念著名文学史家王瑶先生诞辰100周年

○许荻晔



王瑶先生晚年

“不说白不说，说了也白说，白说也要说。”

现在已是社会流行语的这句话，出自何人之口？据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介绍，它出自自己的导师、著名文学史专家王瑶之口。

王瑶1914年5月7日出生于山西平遥，

1934年考入清华中国文学系，1943年起师从朱自清研究中国古典文学，毕业后留校任教。1952年因高校院系调整，王瑶进入北大中文系，当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许多学者如钱理群、陈平原、孙玉石等，都是“王门弟子”。

2014年5月7日是文学史家王瑶诞辰100周年。北大中文系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、山西省作家协会共同主办“精神的魅力——王瑶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·研讨会”。

会上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温儒敏、北大中文系教授严家炎、孙玉石、谢冕、陈平原、钱理群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园等对王瑶进行了回忆与追思。

一生三大贡献

在陈平原的眼里，王瑶的一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：1943年到1952年是清华十

年，可以概括为学术史；1952年至北大到1977年“文革”结束的25年，可以概括为革命史；从1978年开始招研究生到1989年逝世的12年，可以概括为教育史。

王瑶的学术贡献，被温儒敏归纳为：第一大贡献是中古文学三论；第二大贡献便是《中国新文学史稿》；第三大贡献是人才培养。

在温儒敏眼中，导师的第一个贡献“与鲁迅、刘师培的研究可谓三足鼎立”。第二个贡献，是指王瑶整理编写出上下两册、60万字的《中国新文学史稿》，他也成为中国新文学研究史的学科奠基人。但因许多批评者看不到这份史稿在独有的年代独特的价值，所以招致“体制内外都有批评”。

“史稿在特定的时代受制约，但有属于自己的追求和文学史的构想，既满足了时代的要求，又不是简单地执行意识形态的指令，整合表述的过程中尽可能地表现出历史的多元和复杂性，特殊地位是其他同类作品不能代替的。”温儒敏说。

在人才培养的贡献中，温儒敏认为，导师的名言“不说白不说，说了也白说，白说也要说”，透露出的批判精神，对学生们做人、做学问都有潜移默化的影响。

心中清华重于北大

而让陈平原最为看重的是，晚年王瑶做了两件前途无量的事情。第一件事情就是提倡学术史的研究；第二件就是为清华学科“招魂”。

王瑶曾不止一次地告诉陈平原，为什么做学术史研究，因为深感晚清以降百年以来，中国的研究格局越来越小，水平越



1945年，在昆明跟随朱自清先生读研究生的王瑶来越低，一代不如一代。

而第二件事凸显了清华研究的价值。在王瑶心中的学术版图，清华的业绩在北大之上。“王先生晚年多次说他是清华的，不是北大的。”

陈平原分析，王先生之所以坚持属于清华不属于北大，首先是他特别表彰清华的学风和文化，这是一种可能；从21岁到39岁和清华结下不解之缘，而在北大的不愉快之多，这是可能之二；王先生的论著《中古文学史论》出版于清华时期，这是可能之三。

“王先生所遭遇的困境，到底是学校的问题还是时代的问题？如果没有院系调整，一直生活在清华园的王瑶是否会遭遇他在北大遭遇到的这些情况？”陈平原发问之后感慨：今天讨论王瑶，需要认真清理的不是文学观念，而是深受意识形态影响和制约的大学制度。

用扑克占卜命运

严家炎1958年秋留北大任教，与王瑶

□ 百年诞辰纪念文稿



1948年，清华大学中文系师生合影，第二排左5为朱自清，左6为浦江清，右2为王瑶

共事。当时因“反右”运动的余波，王瑶被当做学术上面的白旗受到批判，并被撤去了全国政协委员等职位。

曾是“一二·九”时代的地下党员，一夜之间忽成“白旗飘飘”，王瑶非常想不通。“有一次，我们俩人聊天，他说觉得个人无法掌握命运，只得拿起扑克牌玩打通关这样的游戏，看究竟这样走还是那样走会走通。”严家炎回忆说。

“文革”中，王瑶因将一张背面印有毛泽东像的报纸放在尿盆底下，遭到保姆揭发，被认定是“三反分子”。除几次遭到毒打外，还被从原来的住宅赶了出来。

王瑶幽默，爱开玩笑。三四十岁时，他的头发该黑的却早白了，牙齿该白的反倒变得焦黑，他说自己“黑白颠倒”。又因糖尿病每天必须多喝水，同时又喜欢用烟斗抽烟，他又说自己“水深火热”。

在不太正常的时代中，这些玩笑之言

被人作别样的理解，因此他没少吃苦头。1957年夏天“反右”时，他和几位教授去青岛编教材，说了一句：“这下子可以躲开火热的太阳，也躲开火热的斗争。”此话在后期“反右”和“双反”运动中成了他受批判的题目。

“文革”结束后，王瑶对许多事情看得更透，心胸更豁达。事后，他对揭发批斗的人一般都采取宽容、原谅的态度，“事情都有自

己的条件，在那样的环境中难免会做些错事，不要过多地责备他们，回头看看我们自己过去写的东西，还不是多多少少也打着时代的烙印。”

虽经历“文革”，王瑶性情未变。上世纪80年代，王瑶的全国政协委员职位被恢复，他在政协会议上围绕委员们发言而流行的口头禅“不说白不说，说了也白说”后加了一句“白说也要说”。他还告诉学生，不要做“二道贩子”一样的伪学者，要拒绝诱惑。

1989年11月20日，王瑶来沪参加巴金学术讨论会时，在开幕式上发言因体力不支而入院，是年12月13日在华东医院病逝。据孙玉石回忆，12月2日，王瑶感觉稍好，给女儿王超冰写下这样一段话：

“我苦于太清醒，分析了许多问题，自以为很深刻，但不必说，不如痴呆好！”

（转自《东方早报》2014年5月8日）